

Between Experience and

Transcendence



在经验 与超验之间

景凯旋 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 东方出版社

Between Experience and
Transcendence

在经验 与超验之间

景凯旋 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東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经验与超验之间 / 景凯旋著. — 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8.12

ISBN 978-7-5207-0585-1

I. ①在… II. ①景… III. ①西方文化—文化研究 IV. ① G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13224 号

在经验与超验之间

(ZAI JINGYAN YU CHAOYAN ZHI JIAN)

作 者: 景凯旋

策 划: 陈 卓

责任编辑: 陈 卓

责任审校: 凌 寒 金学勇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

邮 编: 100007

印 刷: 北京市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13.25

字 数: 28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207-0585-1

定 价: 59.0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我社负责调换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85924602 85924603
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助

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诱惑，人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，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时，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。这样的时刻使我感到，历史是喜欢开怀大笑的。

——昆德拉

我们坚持一件事情，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了会有效果，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。我从小就感觉到有一种高于我的存在，那是意义和最高道德权威的所在。而且，在“世界”的事件后面，有一种更深刻的秩序和意义。

——哈维尔

一个人如果不能在自己内心找到自由，即使法律再好，即使他对世界对人有最大的判决权，他也不能在世界上找到自由。如果不在他自己的灵魂里滋生高尚，谁也无法赋予他高尚；如果他不能从自己戴上的枷锁中解救自己，谁也不能将他从枷锁中解救出来。

——克里玛

目 录

前言	001
绪论 走出叙拉古	007
第一章 现代性观念的危机与回应	
一 两种现代性	031
二 理性与浪漫	062
三 乌托邦理念	095
第二章 昆德拉的怀疑主义	
一 从激情到怀疑	131
二 历史的玩笑	144
三 质疑激情	155
四 刻奇：一个抒情范畴	172
五 反讽与无意义	186

第三章 哈维尔的超验意识

一 荒诞的理想主义	211
二 “生活在真实中”	— 229
三 重寻价值之源	246
四 反政治的政治	268

第四章 克里玛的人文精神

一 回到问题的根源	287
二 布拉格精神	301
三 反抗荒诞	315
四 寻求失去的意义	334
五 一个亲嗣关系	351

结论 在经验与超验之间	367
-------------	-----

附录 两种知识分子	384
-----------	-----

参考书目	403
------	-----

前言

这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几位当代捷克作家，同时也讨论了其他几个东欧作家，但它不是一部文学史研究——既不是一部捷克的文学史，更不是一部东欧的文学史，这样的研究希望以后有人会去做。就此书的主旨而言，这是一部当代东欧作家的观念研究。

1985年，我第一次读到昆德拉的小说《告别圆舞曲》，小说的主题和人物都给我留下极深印象。它与当时国内的新时期文学不同，不是那种讲述抚慰的故事，也与当时不断引进的西方现代小说不同，没有那种荒原的色彩，但它却是荒原，且与我们的真实体验相似。在我看来，昆德拉的小说写出了生活的真相，这使我从此开始关注东欧文学。

这部小说属于企鹅出版社出的一套丛书，题为“另一个欧洲的作家”。后来我知道，“另一个欧洲”的说法出自波兰诗人米沃什，他的散文《被禁锢的头脑》表现出对时代潮流的敏锐洞察力，昆德拉也有同样的特点。这种洞察力不需要多么深奥的思想，而只需要对生活的真实感受。用捷克作家哈维尔的话说，就是脱离历史进程的思维，回到本真的“自然世界”。在这个本真世界面前，各种被奉为真理的现代观念立即就会破绽百出，暴露

其全部的谵妄和荒谬。

我把昆德拉的这部小说译成中文，由作家出版社在1986年出版，中文书名译作《为了告别的聚会》。此后，我又与妹妹合作，陆续逐译了昆德拉的《玩笑》《生活在别处》，以及捷克作家克里玛的《我快乐的早晨》《布拉格精神》等。由于特殊的境遇，东欧作家更深切地感受到存在的荒谬，他们描写自己的家园，却没有家的感觉。美国历史学家托尼·朱特在评论捷克作家哈维尔时，曾引用了一句诗：“一个民族如果从来没有开过口，那么他们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诗。”^①显然，这也是整个东欧文学的价值所在。渐渐地，我对东欧作家越来越有兴趣，尤其是他们作品中所体现的东欧观念。

说到“东欧”一词，许多东欧作家都认为这只是个政治概念，在他们眼里，东欧国家实际上属于“中欧”，东欧文化在总体上归属西方文化，经受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，所以他们的文化与俄罗斯文化不同。这种对欧洲的乡愁实际上是出于对苏联帝国的反抗，渴望一种更加人道的价值体系。东欧各国的历史虽然不尽相同，历史上曾分属奥匈帝国、奥斯曼帝国及一些自然联盟的国家，但在20世纪，这些国家都经历了纳粹占领和苏联式统治，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。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命运决定了多数东欧作家不会赞赏“为艺术而艺术”，更不可能视文学为消遣。

这是一个杰出的文学群体，诸如波兰的米沃什、赫伯特、希姆博尔斯卡、扎加耶夫斯基、巴兰察克；捷克的赛弗尔特、哈维尔、昆德拉、赫拉巴尔、瓦楚里克、克里玛、穆纳科；匈牙利的凯尔泰斯、康拉德、哈拉兹蒂；罗马尼亚的米勒、马内阿、布拉加；南斯拉夫的契斯、米哈耶罗夫；保加利亚的马尔科夫；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；等等。就创作的主要倾向和

^① 托尼·朱特：《战后欧洲史》卷三，第244页。

风格而言，他们的作品既有差异性，又有共同性。

东欧作家大多是知识型、思想型的作家，同时又因其抗争而具有诗人的激情特征。按照奥地利作家布罗赫的看法，文学是不充分的，它缺乏神话与逻各斯的强制力。我赞同这样的观点，在这个意义上，观念的表达成为东欧作家的一个重要特征，对此他们并不特别感到困扰。世界本来就是一个问题的存在，展示这个存在正是文学的作用，而没有思想的文学作品是缺乏价值的。实际上，西方现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学都是在表达一种对世界的认知，只不过他们往往止于揭示问题，而东欧作家则试图找出问题的原因，甚至解决问题的途径。总之，他们在文学作品中思考得很多。

正如历史学家托尼·朱特所说，20世纪下半叶，还没有一个法国知识分子奠立自由理论的基础，^①而与此同时，真正具有创造性的重要变化却发生在铁幕另一边的欧洲。^②

就此而言，东欧作家既是一个命运共同体，也是一个思想共同体，他们大都有着明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，并且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，因而他们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。

面对现代性的各种问题与后果，东欧知识分子的思考在本体论、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迥别于西方知识界，他们的阐述始终围绕着现代意义的危机，并对现代世界的这一最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。与不断追求思想时尚的西方知识界相比，东欧作家对于现代的种种非人化现象，表现出伦理上的强烈不适。他们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切中时代的本质，因而也更加具有研究的价值。

① 托尼·朱特：《未竟的往昔》，第415页。

② 托尼·朱特：《战后欧洲史》卷三，第169页。

这使我得以从观念的角度去研究东欧作家，或者说从文学作品中去探讨他们的观念。我意识到文学虽是一个自足的系统，但并不能反映世界的全部。那种文学家为世界立法的浪漫主义观念正是东欧作家所反对的。为此，我阅读了许多有关东欧历史、哲学、经济和政治的书籍，并试图将这些不同学科的知识整合在我的研究中。这样做比我想象的要困难许多，同时也使我体验到通过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以寻求问题答案的乐趣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把东欧研究视作一种提升自我认识的过程，并逐渐形成了撰写此书的中心思路和整体框架。

在思考与研究的过程中，我越来越发现东欧作家有着独特的思想路径，近代理性主义主张的统一性曾导致建构理想社会的冲动，要消灭人的差异性，而非理性主义内蕴的差异性却又导致价值相对主义。作为对现代危机的回应，东欧作家意图寻求失去的意义和传统伦理的复兴，重新为价值世界建立起一种形而上标准，这一诉求源于现实生活本身。随着阅读面的扩大，东欧四十年的真实面目逐渐呈现在我眼前，我看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那种激情是如何产生，如何消失，同时又如何形成了另一种激情。这两次激情迥然不同，第一次是为了平等，第二次是为了自由。

这些观念的剧烈震荡背后呈现出的是欧洲思想的整个源流，那是一种雅典与耶路撒冷的文化，伴随着怀疑与狂喜的冲突，近代的宗教祛魅和理性昌明导致了价值的世俗化，同时也导致了价值的粗鄙化和虚无化，但西方文化中那种“普罗米修斯—浮士德精神”仍然存在。它有时漫过堤岸，泛滥成灾，有时渗入地下，在地下奔流，然后又溢出地面，进入另一条河床。而每一次的迁流变动都会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。

正是由于此，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，我常常想到柏拉图、胡斯、密尔顿、托克维尔、朱利安·班达、以赛亚·伯林和列奥·斯特劳斯这样一些

欧洲的思想家们，感受到东欧知识分子与他们在精神上的一脉相承。东欧观念启发我去阅读这些欧洲思想家们的著作，并反过来运用其中的许多概念去分析东欧观念，探讨何为人性的基础。质言之，如果说东欧作家的思考在 20 世纪具有重要的价值，那么在经济全球化的 21 世纪，他们的思考仍然具有精神上的启迪。

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东欧作家的创作都属于世界一流水平，就文学作品的艺术评判而言，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多。但如果说他们的作品还算不上最顶尖的艺术，这并非因为他们对现实政治的关怀使他们的作品变得狭窄，莎士比亚、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卡夫卡、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写作都涉及政治，但他们却是举世公认的伟大作家。

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很清楚，最近一百多年以来，世俗权力越来越无所不能，日益侵入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，甚至试图控制人的内心，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。政治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，以至于到了这样的地步，倘若一个人的头脑中从来没有浮现过权力的面孔，只能表明他一直生活在谎言中，缺乏正直和诚实。而一个作家身处这样的社会却对此不置一词，他对生活、人性的观察和判断在我看来就终究是可疑的。

此书的搜集资料和写作过程花费了三年时间，我要感谢我的美国学生韩瑞亚（Rania Huntington）、加拿大学生石峻山（Josh Stenberg），他们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外文资料。我也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，他们的关怀和鼓励一直是我写作的动力。此外，此书得到了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，我要在此深表谢忱。

景凯旋

2018 年 7 月于南京

绪论 走出叙拉古

在知识的世界里，善的观念是最后才出现的。而且

必须付出巨大努力才能看到。

——柏拉图

当我们用道德反抗世界的秩序，当我们质问这恐怖的喊叫由何而来时，我们就开始了对个人身份的捍卫。

——米沃什

他们认同人道的价值，但却生活在英雄的价值之中。

——米奇尼克

20世纪人类历史的最显著特征是被某种观念驱使的群体运动，它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价值与事实的严重冲突。一方面，科技文明主导的现代性阔步前进，人类物质生活得到了巨大改善，自由、平等的现代观念深入人心；另一方面，现代性造成了现代人内心的紧张和厌倦，权力机制前所未有地扩张，不断威胁着人的人类意识，带来严重的非人化危机。换言之，现代性曾激起人类最美好的乌托邦想象，同时又导致了历史上最残酷的暴行，人的解放变成人的奴役，实然经验与应然理想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对抗。

这一切都与现代人的观念有关，尤其与创造和传播观念的知识分子有关。面对现代的非人化危机，西方人文学者在观念上给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。马克·里拉在《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》一书的后记中指出，思想家们对此存在着两种主要叙事。以赛亚·伯林将非人化现象归因于现代理性主义，即相信人类可以有一个解决一切问题的终极方案，它在思想方法上的绝对主义、普遍主义、决定论、不宽容以及对多样性和多元主义的敌意，本身就具有暴政的特质。另一种叙事正好相反，将非人化现象归因于非理性主义，如诺曼·科恩即认为，现代暴政与宗教的神秘主义、弥赛亚的拯

救信念、千禧年学说及天启思想有关。这两种叙事都能自圆其说。如果从计划经济、种族或阶级分类、意识形态控制、秘密警察网络等方面去考察，人们会联想到理性主义的观念；但如果从领袖崇拜、狂欢的群众集会以及用暴力改造世界的激情去考察，人们又会想到非理性主义的观念。^①

问题在于，这两种叙事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观念现象，那就是轴心时代建立的神圣知识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全面衰落。从观念史的角度看，轴心文明是人类的第一次观念突破，其标志就是一个具有超验维度的哲学或宗教出现，由此奠定了文明的普遍价值，并以超验、永恒和绝对的道德善作为人类活动的目的。现代性则是人类的第二次观念突破，肇始于文艺复兴的“人类中心说”，标志着超验世界的式微，人类越来越脱离超验的自然世界的监护，人的目的（善、公义、救赎等）转变为人是目的，自我保全的欲求成为正义和道德的唯一根源，由此产生了财产权、个人权利、社会契约、社会平等以及国家、民族等观念。而随着价值与事实的分离，道德善在价值秩序中的地位愈益式微，其根源和标准也从超验之物转换成主观的理性（快乐、进步、公意）或主观的非理性（心灵、真诚、情感）。这种以世俗性为特征的现代性进程历经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，每一次都在人是万物主宰的前提下，试图通过古典的回归来对现代的道德沦丧进行纠偏，结果反而更大地推进了现代性，以更加强化的历史原则来取代传统超验的普遍原则。最终，在列奥·斯特劳斯所说的第三次浪潮中，亦即以赛亚·伯林所讲述的浪漫主义时期，现代的种种启蒙与反启蒙观念交汇在一起，使得包含普遍价值的德行彻底崩坍，人们不再具有分辨善恶的

^① 马克·里拉：《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》，第193-199页。此书英文原题目为“*The Reckless Mind*”，直译应当是“不计后果的心智”，与马克斯·韦伯所说的情意伦理是一个意思。